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华侨关系探析

耿明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孙中山曾言:“华侨是革命之母。”长期以来,在孙中山研究领域,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的研究,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华侨关系,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事实上,孙中山在整个革命阶段都与华侨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以辛亥革命为分界,其前后的侧重点有着明显的不同:前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寻求军费支持,以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开展;后一个阶段主要是向华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使其对新生的民国充满信心并予以支持。

【关键词】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华侨;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1-0084-05

作为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作出了毕生的努力。而在历来的学术界探讨中,关于孙中山的研究也一直是热点问题之一。2011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之际,以此为契机,史学研究领域也再一次掀起了孙中山热。如同李文海所言:“孙中山的思想、学说和他的伟大实践,是一个研究很久、为大家广泛关注、已经有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的老课题。很多问题已经讨论过了,很多问题也已经研究得相当深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学术起点已经很高了。”^[1]

然而,在纷繁复杂的学术成果中,侧重点都集中于三民主义学说及其发展、孙中山的社会变革思想、孙中山的比较研究等方面;^[2]而对于孙中山与华侨关系,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华侨关系这一问题上,则观点不一。事实上,孙中山一直与世界各地,尤其是南洋地区的的华人华侨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为革命事业铺平道路。以笔者愚见,孙中山与华侨的关系以辛亥革命为界,前后的目的、方式与方法皆有着明显区别。前一阶段,孙中山主要是以互通信件的方式,向华侨寻求军费支持,以利于革命事业的顺利进行;后一个阶段,主要是通过演说和电报的方式,向广大华人华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使其解除对于革命的疑惑,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信心。

一、革命前的当务之急——军费支持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后,数次谋求起义未果,而后又于伦敦蒙难,经康德黎等人设法营救脱险。经过这几次挫折后,孙中山改变了革命策略,开始脱离遥远的欧美地区,转而向毗邻中国南方边境的南洋地区经营。而

要扎根于这一地区,首先要获得这一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华侨华人的支持——唤起他们的爱国之心,使之倾向并支持革命,成为了当务之急。这一时期,孙中山与南洋华侨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信件和部分会议记录的方式保存下来,多见于《孙中山全集》第一、二卷。

比如,1906年7月17日,在当时的英属马来邦森美兰州首府芙蓉(Seremban,又译塞伦班),孙中山与爱国华侨朱赤霓、黄心持、李梦生^[3]等人谈及革命大势时说:“近一、二年来,内外赞成革命者大不乏人,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满虏乃始下诏维新……继则公然宣布立宪预备九年之开会,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实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3]p293}

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后来的历史进程证实了孙中山的准确判断。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华侨关心的“中国革命军起事,外国有无干涉”的问题,孙中山认为,外国干涉,中国被瓜分的危险,根源在于中国不能自立。若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一切困难都将会迎刃而解。^[5]

中国之崛起而屹立于世界之东方,这样的宏图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个提出来的,但历史使命却在当时落到了他们的肩上。中国要自立,就必须推翻满清;要推翻满清,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而在当时,革命浪潮已经在中华大地掀起波澜的形势下,用以购买军火的军费就显得尤为重要。孙中山先生并非出自显赫之家,军费由他个人承担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像上文那样单纯地传播革命思想,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与华侨的联络中,是并不多见的。更多的时候,寻求军费支持才是重中之重。如1906年9月26日,孙中山在致爱国华侨苏汉忠^[6]

收稿日期:2013-12-10

作者简介:耿明(1990-),男,安徽合肥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的信函中说:“您的爱国热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满族已处在衰落和死亡之中,我们事业重大,但并非难以完成……我们若不趁此良机,则将沦为外国人的奴隶……”“希冀你在爪哇唤醒华人的爱国心,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目前至关重要是军费,一旦得此,便可随时发动驱除篡夺者的战争。然而军费唯有在爪哇等富庶地区始能筹集。你的工作是高尚的,而我国命运则取决于此工作的成败。请坚决进行,切勿迟疑。”^{[1]p294}至于后来苏汉忠是否将军费汇于孙中山处,在其著作中并没有交代,但从不久之后钦州起义的顺利发动来看,孙中山筹集军费的计划还是顺利实现了。

钦州起义是辛亥革命之前,同盟会组织的重要起义之一。1907年9月,经孙中山等人领导,革命军已经攻破桂南重镇防城,而后向钦州进发。在得到华侨的军费支持后,革命军趁势连破横州、永淳两县(南宁府属),军威大振。但革命军毕竟势单力薄,钱粮匮乏,防城等地虽重,但不足以作为长久的根据地。当时,孙中山的计划是北上夺取广西中心城市南宁,用以巩固革命基础。在当年10月8日致爱国华侨邓泽如的信函中,孙中山指出:“(防城、钦州等地已下)全军进取南宁府城……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现今革命军好义有勇,人心坚定,固可以进取无前;惟必需接济军需,使其军械足用,军饷不缺,然后声威大振,势力增加,此为目前最要之事。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贵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今内地同志既为国民出死力以求自由,切望同志诸兄慷慨仗心,筹款接济,以冲拓革命军之实力,使得一战破敌,斯则同志诸兄之责任,而国民之属望者也……望我同志诸兄接此信后,照弟前函所言,由同志中举出委员专任运动筹款之事。”^{[1]p345}

邓泽如与孙中山关系甚密,有兄弟之义。在此信中,孙中山提出了自己的军费需求,同时,对于筹集军费的困难性也作了充分地估计。他提出在南宁城破后建立军政府,对于捐资助款者,必定以厚利偿还的计划。且不论此计划的可行性如何,单是攻破南宁建立军政府一事,对于当时的革命军来说,就近乎于天方夜谭。革命军队虽挟胜利之师,但也毕竟是有所损失,且长期征战的疲惫之师。南宁更是广西省中心,清政府当时已集全省之力来救,革命军的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但这次起义对于孙中山有多重要,从他两个月后写给邓泽如的另一封信中即可得知:“今者义军

崛起已阅五月,根据坚定,屡破清兵,满洲政府倾两省重兵聚于一隅,而皆不能与义军敌,则革命军之势力可知矣。弟谋事十余年,以为如此机会,实不易再得。今革命军尽心戮力,已足以对国民,所望者各省之响应与海外之接济耳……”^{[1]p351}

好一句“谋事十余年,以为如此机会,实不易再得”!从檀香山起事到断发改装,从伦敦蒙难到钦州扬名,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令人起敬。至于邓泽如后来是否将军费汇至,孙中山在后来两人往来的信件中也有所交代:“去腊新加坡同志汇来兄所捐军费一千元,已收……倘能得款二十万或十余万,则大事之成已在把握中矣。……”^{[1]p360}

尽管一千元对于庞大的军费开支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但这毕竟体现了以邓泽如为代表的华侨们的拳拳爱国之心,也稍解了革命军的燃眉之急。但“倘能得款二十万或十余万”的要求,对他们而言,未免有些不切实际。钦州起义的失败,归根结底还是革命的基础不够牢固,时机尚不成熟,与军费的多寡关系不大。

前文已经交代过,邓泽如在任挂罗庇劳埠同盟分会会长之后,与孙中山往来密切。由于年长于孙,故于信中,孙中山尊称其为“吾兄”。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07年底到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这四年的时间内,二人往来信件竟然高达38封!须知彼时孙中山在世界范围内奔走呼号,革命大势让他欢欣鼓舞,但革命事业同样足以让他焦头烂额。能在如此情形之下与邓泽如保持这样的联系,足见孙中山对于华侨关系的重视程度。二人往来信件的内容,据《孙中山全集》所载,除讨论当时的革命大势,如“虏家子母相继死亡,人心必大动,时局可为……”,^{[1]p398}还多次提出了筹集军费的请求。^{[1]p363}

尽管在今天看来,孙中山屡次索求军费似乎有失常理,但在当时的革命情形下,也实属无奈之举;而据往来信件反映,以邓泽如为代表的爱国华侨们,对于孙中山的请求也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反感,总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许多并不宽裕的爱国华侨来说,委实难能可贵。

二、革命后的伟大使命——走向共和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袁丁曾表示:“从购买枪支弹药、提供办报经费、资助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经费到照顾孙中山的家用,海外华人一直给予孙中山革命事业源源不断地支持。否则像孙中山这样毫无收入来源的职业革命家,根本无法展开活动。”粗

略估算,单是在辛亥这一年中,南洋华侨的捐款就有五六百万元,这对于孙中山开展革命运动无疑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多年的努力,革命的基础已经初步具备,四川保路运动更是为革命提供了契机。1911年10月10日,革命的火焰首先在武昌爆发,而后迅速蔓延至整个南中国,清政府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一个月后,清帝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一起覆灭,革命的第一目标已经实现。

孙中山多年为革命而奋斗终于有了回报,而他与华侨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革命大业已初成,筹集军费显然已经不再是与华侨往来的第一要务。而今,面对两千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中国,人们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广泛传播民主共和思想,使广大华侨华人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信心并予以积极支持,成为了伟大先驱的伟大使命。

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孙中山与邓泽如多次以电报、信件的方式往来,谈及革命的前途问题。这与之前信件的内容大相径庭。在当年12月21日致横滨华侨的电报中,孙中山指出了此次革命的目标:“(论及南北谈判)……吾党之希望虽素不在媾和,而亦并非全不欲和,战亦非吾目的也。吾党素志之共和政体,近由议和谈判之结果,可见其成立矣。更望诸君大表同情,注视其成行。”^[57]言下之意即是,根据谈判的情况,共和政体已经呼之欲出。孙中山希望以此鼓舞广大华侨同胞,对新生的共和政体予以理解和支持,以利于革命大业。

1912年以后,或许是由于工作方式和革命任务都发生了变化,孙中山与华侨往来的方式,除了信件以外,更多是以电报和现场演说为主。在1912年1月致南洋侨胞的信函中,孙中山谈到:“自武汉义旗一举,汉室光复,海内外同胞莫不共庆昭苏,重睹天日。目下共和政府成立于南京……共和前途,实嘉赖之(海外侨胞的贺电与支持)”^[55]

此外,孙中山在信中还提出了为中国电戏影画筹备善后补助会提供帮助的请求。虽然貌似是小事一桩,但是足以体现孙中山与华侨的往来重心,已经转移到对新生的共和国建设上来了。孙中山在后来的演说中,更是多次提到了筹办银行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事务:“拟联合多数银行、法国资本合资创一极大银行;其利无穷,如次第推之于矿产、铁路、机厂,则吾国富强可与美国相抗衡矣。”^[59]

对于当时华侨华人关心的袁世凯是否能够胜

任大总统一职的问题,以及其是否忠于革命一事,孙中山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仆满清而建民国,今日之袁君,为国民之分子。总统既非酬庸之具,袁君即为任劳之人。诸君观其从容敷施,行国民之意,使民国之根基,由临时尽力维持而完国焉。”^[61]

应当说,孙中山的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袁世凯的能力自然毋庸置疑,事实上,如果没有袁世凯,革命党人推翻满清的大业可能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至于后来袁世凯的各种兴风作浪,则远远超出孙中山的预期。此外,孙中山还在演说中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指出了道路。^[60]他希望以此能够消除人们对于袁世凯封建军阀身份的误解,同时改变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中国对于日本的敌视态度,对新生的中华民国充满信心。但后来历史发展的走向,无论是对于袁世凯还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同样耐人寻味。

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社会扎根已久,新生的中华民国遭遇的困难体现在诸多方面——民主政治前途的不明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缓慢,封建文化复古逆流等等。而广大华人华侨对于共和政体的前景,同样也多持怀疑和观望态度。为了向全球华人华侨阐明共和之路的前景,描绘民国的伟大蓝图,孙中山在1913年3月13日于神户华侨欢迎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

“汉族光复,我四万万同胞之地位深易之。今日之国家,为我四万万五族公共之国家,我四万人成了中华民国之主人,且将来子子孙孙永享主人幸福。

但中华民国成立,不过第二年,改革虽已成功,惟建设尚在幼稚。旧屋既倒,然新屋未成,我同胞仍是在困苦之中,必俟建设完全,方能安享幸福。以新生男儿之事类之……今日我中华民国成立,本来最欢喜之事,但欢喜之中,切不可忘了我等现尚在艰难困苦之地位。

但是,现今状况幸福未至,共和政体似不及专制政体。独不见美洲之黑奴乎?今日艰难之建设,为最高之代价,可以买将来之安乐。所望我同胞同心协力,共谋民国巩固,以图异日之幸福。

现今我国外交非常之危险,财政所拮据者,不过两万五千万。以中国四万万每人负担一元,即得四万万。一言以蔽之,今日与从前之地位不同,我国之能否富强,实系乎我同胞之能否负国民之责任耳。”^[66]

此篇演说词为笔者最推崇之作。孙中山先生对于革命的现状都耐心地给予了描述。对于华人华侨关心的共和国前景问题,以美国为例,也指出了光明的道路。同时,以外交和财政问题为例,对中华民国的建设方案描绘了整体框架。的确,革命不仅是革命党人的事,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建设新生的民国,也不仅是国民政府的职能,更是广大同胞应负的责任。须知望子孙成人,必须先培养他,教育他,使他建功立业,报答父母。现在的民国,也好像刚诞生的孩子一般,必须多加培养,打好基础,才能成才。所以中华民国的成立自然是好事,但欢喜之余,千万不能忘记了我国仍然处于艰难困苦的地位——孙中山向华侨,也是向全体中国人民发出这样的告诫和期待。

当时,华侨生活在异国他乡,对侨居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清政府长久以来对外的软弱,导致他们在生活中处处遭遇到歧视,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他们主动接受民主思想,这是他们积极参与辛亥革命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发表的一系列演说,增强了华侨华人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信心,同时,也对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笔者的几点愚见

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孜孜不倦地奋斗了一生,他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令人钦佩。没有孙中山,中国或许还要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挣扎很长时间;而如果没有广大华侨华人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同样会艰难很多。

而在辛亥革命以前,华侨之所以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为,多半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同时,他们生活在异国他乡,经常会受到各种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没有强大的祖国为后盾,因此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局面;辛亥革命之后的各种行动,则更加出于他们的爱国之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孙中山及其助手林森、赵声等人的宣传作用。

1912年初,荷属爪哇岛泗水市的华侨在庆祝中华民国成立的游行中,竟然遭到了荷兰殖民当局的武力干涉,冲突中有3名华侨死亡,百余人被捕,华侨创办的书报社被封。消息传来,举国震动。孙中山当即表示:“民国初成,岂容藐视。请严正交涉,以尊国权。”2月26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议

决对荷兰交涉的四项条件:一、限三日内释放被捕华侨;二、赔偿财产损失;三、对被害者给予赔偿;四、恢复人权,华侨与欧侨和日侨一律对待。同时指出“如无满意答复,民国自有相当之对待。”这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来说,无疑是外交上的一次胜利。而与软弱的清政府相比,新的民国对待他们的态度,也足以告慰多年来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爱国华侨们了吧。

从早期的以信件方式寻求军费和政治庇护,到辛亥革命后多以演说的方式广泛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孙中山在与华侨的各种往来形式之中,核心的思想便是有利于革命。而如果以早期多次向华侨索求军费来贬低孙中山的行为,显然有失公允。须知革命的出发点决定了整个革命阶段的策略行为。在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极度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情形下,爱国华侨与华人几乎是唯一可靠的力量。同样,民心可用,既然爱国华侨愿意为改变祖国的境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革命派为何不团结这派力量呢?

那么,爱国华侨在辛亥革命前后对于孙中山的支持,又应当如何定位呢?在护国运动之后,孙中山在写给中华革命党各支分部的信函中说:“(护国运动)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也。计此次回国从军之华侨,一部活动于广东(南洋等地),一部于山东(美洲、日本等地)。

广东经战斗多,华侨中死伤者颇多,东北军幸尚未损伤,然华侨之勇气热心,益为同志所敬重,世人多惊服矣。

……华侨之光荣,即吾党之光荣,亦即国家之大幸也。”^{[8]P.39}

这句话应当是对孙中山许多年经营与华侨关系的真实写照。而华侨对于祖国革命的贡献也有目共睹,从提供资金的间接援助,到直接出人回国参战,华侨华人的爱国之心,可昭日月。

应当说,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与华侨的关系经营是相当成功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正确的革命策略,另一方面需要归功于广大华侨华人的爱国之心。当然,这与革命先驱的伟大个人魅力等因素也有一定的联系。至于少数华侨对于孙中山所持的敌对态度,以及孙中山对华侨所阐述的中日关系是否稳固,一些值得反复推敲的问题,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注释及参考文献:

- 李文海.孙中山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创新[J].广东社会科学,2008(3).
- ②刘玉青.近十年来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新观点综述[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7(3).
- ③朱、黄、李等人后均为当地同盟分会骨干.
- 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⑤同④,并见汪精卫.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N].民报.
- ⑥苏汉忠当时在印尼爪哇岛活动,倾向革命.
- ⑦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⑧孙中山全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唐若玲.海南华侨与孙中山[J].湖北社会科学,2012(7).
- [2]马孝奇,颜明婷.华侨黄三德与孙中山的美洲筹款活动[J].兰台世界,2012(7).
- [3]曾氏清香,金晶.越南华侨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J].档案与建设,2011(5).
- [4]吴前进.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J].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3).
- [5]方雄普.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发展[J].今日中国(中文版),2013(7).
- [6]梁行.华侨华人与孙中山的百年情结[J].华人时刊,2011(10).
- [7]章扬定,陈庆胜.辛亥革命时期华侨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J].广东社会科学,2012(1).
- [8]陈景熙.辛亥革命前后泰北华侨社会演变考:以南邦府为研究案例[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
- [9]郑炳山.缅甸泉籍华侨与辛亥革命[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3).
- [10]冯晓蔚.华侨与辛亥革命[J].春秋,2011(3).
- [11]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孙中山与华侨“孙中山与华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广州市: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 [12]任贵祥.孙中山与华侨[M].哈尔滨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13]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M].广州市: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 [14]郑民,梁初鸣.华侨华人史研究集[M].北京市:海洋出版社,1989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GENG 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in the domain of Sun Yat-sen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n Yat-se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especiall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has obtained certain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laces worth further discussion. In fact, in the whole stag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un Yat-sen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close contact with overseas Chinese, and, with the revolution as the boundary, the emphasis had obvious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it: the previous stage was mainly to seek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sylum for the overseas Chinese, while in the latter stage he was mainly to spread democracy republican ideas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to make them full of confidence and give support to the new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Sun Yat-sen; the overseas Chinese;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董应龙)